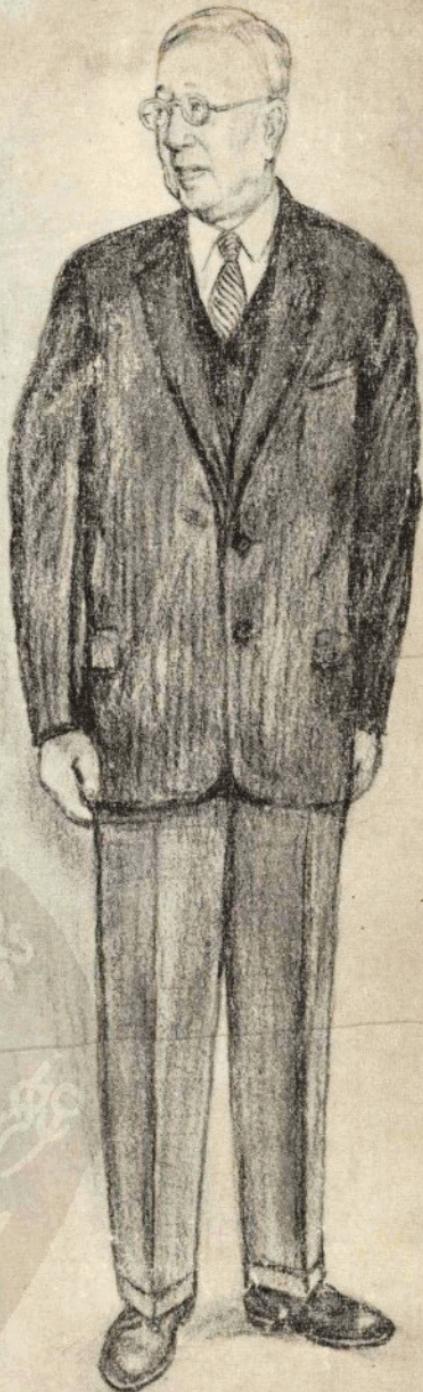


施植之先生早年回憶錄

胡適題



施植之先生早年回憶錄

胡適題



胡適之先生序

一九二七年我在華盛頓第一次勸施植之先生寫自傳。那時他快滿五十歲了，他對我說，寫自傳還太早。以後二十多年之中，我會屢次向他作同樣的勸告。到了晚年，他居然與傅安明先生合作，寫出他的「自定年譜」作自傳的綱領。又口述他的早年生活經驗，由安明記錄下來。安明整理出來的記錄，從施先生的兒童時期起，到一九一四年他第二次出任駐英國全權公使時為止，——就是這一本很有趣味而可惜不完全的自傳。

為什麼沒有全部完成呢？安明說：「施先生開始口述的時候，精力已漸衰了。到一九五四年秋天他大病之後，他的記憶力更衰退了，他的腦力已抓不住較大的題目了。所以這部自述的記錄只到一九一四年為止，沒有法子完成了。」

但是這本小冊子還是很可寶貴的。因為這是我們這一位很可愛敬的朋友最後留下來的一

點點自述資料。如果沒有安明的合作，連這一點點記錄都不可得了。

植之先生生活了八十歲，安明的記錄只到他三十七歲為止。這本記錄可以分作兩大段落：前一段是他在國內國外受教育的時期，後一段是他從美國回來之後在國內服務的時期（一九〇二至一九一四）。

植之先生敘述在上海聖約翰書院的經驗，就是很有趣味的教育史料。「信教學生免費。非教徒繳納學費，最初每年八元，後增至十元，至余離校之時增為十二元。校方除供給食宿而外，每年另給小帽一頂，鞋子兩雙，青布長衫二件，棉襖一件。放學時並給銅錢百文為車費。書籍及醫藥費用亦由學校供給。」這種追記，和「卜舫濟先生留長辮，衣華服，短步規行」一類的記載，都是史料。

植之先生十六歲時（一八九三）就跟隨出使「美日秘國」欽差大臣楊儒到華盛頓做翻譯學生。他在美國留學九年（一八九三——一九〇二）。他追記這九年的生活，比較最詳細。其中最有歷史趣味的是他敘述楊儒時代的駐美使館的內部情形。這種記載，現在已很難得了。

在這九年之中，他曾被駐俄的楊儒欽差去俄京聖彼得堡幫了一年（一八九九）的忙。並且曾隨楊儒到海牙出席「弭兵會議」。可惜他沒有把這一年的觀察和經驗講給安明記錄下來。前幾天夏晉麟先生邀我午餐，我說起我正在看安明記錄的施植之先生的早年自傳，夏先生的第一句話就問：「有沒有他在聖彼得堡和海牙的記錄？」我說：「可惜沒有。」夏先生

和在座的幾位朋友都很感覺失望。

|植之先生一九〇二年在康乃爾大學得文學碩士學位之後，他就回國了。那時他二十五歲。此後他的生活共有三個時代：從一九〇二到一九一四年，這十二三年他在國內服務。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三七年，這二十多年他在國外擔負外交的重要任務。一九三七年以後是他退休的時期，雖然他還替國家做了不少的事。

我們現在所有的記錄，除了他的教育歷程之外，只有他在國內服務的十二三年的追憶。這十三年的記錄裏，最精采的只有三大段：第一段是他在武昌張之洞幕府裏的經驗。第二段是他做京漢鐵道總辦時期的改革。第三段是他在哈爾濱做濱江關道的二十六個月的改革。

在這三大段裏，|植之先生特別敘述一位畢光祖先生的爲人，特別記載這位畢先生給了他很多的指導和幫助。|植之先生說：

「南皮……文案中有畢光祖先生，字枕梅，嘉定人，……與余交好。余每作說帖，皆託爲修辭。畢先生改正之後，往往爲余詳加解說。嘗謂余曰：『文章貴在理路清楚，不必作四六駢體。但求辭簡意明。古人所謂辭達而已矣。』」

他又說：

「畢先生勸余處事要脚踏實地，其公牘圓到，其爲人赤誠，其見解高超，皆爲余生平所服膺。余以一出洋學生，對國內情形隔膜，而能服官州縣（濱江關道係地方官）數年得無限越者，多有賴於畢先生匡助之力也。」

這部自述裏，屢次這樣熱誠的稱許畢先生的助力。

植之先生在濱江關道任凡二十六個月，他的成績是當時中外人士都很稱讚的。他自己也說：

「英國駐哈爾濱領事S. 詈告同僚云：此間交涉事項宜多遷就施道台，使其久于其任。施道台若離任，其規模辦法必皆隨之俱去，因其方法甚新，同時中國官吏不能行其法也。」

我在許多年之後，也會聽美國朋友顧臨先生（Roger S. Greene）說，當時他也在哈爾濱，親自看見施先生的政治作風，他很佩服。顧臨先生說：「那個時候（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〇年）離日俄戰爭才不過幾年，中國的官吏能在北滿洲建樹起一點好成績，為中國爭回不少的權利，是不容易的事，是值得留下一點永久的記錄的。」我也會把顧臨先生的話轉告植之先生，作為我勸他寫自傳的一個理由。

現在他的哈爾濱時期的回憶錄有了安明的筆記，我們只看見植之先生處處歸功于那位畢光祖先生。他說：

「余在濱江關道任二十六個月。……經辦事務煩而且重，前任後任無一終局者。余以出洋學生久任此職得無限越者，得力於畢先生者甚大。就任之始，畢先生告余曰：道署之人，不必多換。「就生不如就熟」。只要長官不貪，下屬豈敢舞弊？……余到任後，未換舊人，而前弊俱去。蓋因余本人於薪俸公費之外，不納分文額外收入。此

亦得力於畢先生「脚踏實地」之教也。」

他記載張勳的兵士正法一案，又說：

「此案乃畢先生所經辦。其人思慮周詳，文筆圓到。余任內重要公文皆出其手，時人多稱道之，每謂余以出洋學生而公事熟悉如此，誠屬難能可貴。實皆畢先生之功也。」

我們讀施先生稱述畢先生「匡助之力」的幾段文字，我們都覺得這位「爲人赤誠而見解高超」的文案先生確是很可以佩服的，——但我們同時也不能不感覺這幾段文字都可以表現出植之先生自己的偉大風度。他能認識這位畢先生，他肯虛心請他修改文字，肯虛心聽他詳細解說，肯虛心請他去幫他自己辦公事，肯全權信任他至十多年之久，使他能夠充分發展他的才能來做他最得力的助手：這都是植之先生一生最可愛的美德。我們看他四五十年之後還念念不忘的說：「我當年的一點點成績實皆畢光祖先生之功」，「實多有賴于畢先生匡助之力。」這樣的終身不忘人之功，這樣的終身把自己的成功歸美于匡助他的朋友，——這種風度是足以使人死心塌地的幫他的忙的了。

胡通

一九五八，十，廿二夜，

在將離開紐約的前七日。

自序

曩者，友朋多有勸余自述生平，存留掌故以備後世參攷者，吾友胡適之先生每為余言，並尤于書成爲撰序文。余久久不欲着筆者，良以時方多艱，愧無建樹，何必多着痕迹，以取干名博譽之譏。

乃近歲息影林園，回憶往事，深感世變滄桑，而同輩逐漸零落。追想余自一八九三年出國游學，嗣後服官出使，以迄一九五〇年，歷六十載。經過前清、民初、以至國民政府之時代，其中經歷瑣事，間有饒有興味而未為後人所盡知者。適來與美邦老友偶談及之，雖余口述不詳，而聽者每覺津津有味，亦有勸余于記性健好之時，擇要發表，以廣傳聞者。

爰於茶餘飯後之暇，與傅君安明講述談論，由傅君隨筆記之，以存掌故。將來整理成冊，於余身後付印，分贈友朋，聊供玩賞，不敢謂為傳記也。

錢塘施肇基序於青山別墅

時民國四十三年夏，公曆一九五四年

目 次

胡序
自序

幼年時代	三一六
留美時期（一八九三至一九〇二年）	七一—七
武昌時代（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	一八一—二三
攷察歐美憲政之行（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	二四一—二六
任職京漢京奉鐵路局時期（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	二七一—三二
在哈爾濱任濱江關道時期（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	三三一—三八
任職外務部時代（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	三九一—四四
民初居京時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	四五一—四七
自定年譜	一—七

施植之先生早年回憶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幼年時代

吾家自魯惠公子施父誕生施伯公，因以爲氏，是爲施氏受姓之始，厥後支族繁衍，徙居各邑。至七十三世祖采石公於清順治七年（公曆一六五〇年）卜居於江蘇省震澤鎮之純孝里，是爲笠澤施氏本支之始。傳至肇基，爲八十一世。

余以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年）夏歷二月二十七日生于純孝里。

震澤居蘇浙邊界，太湖之濱，土壤肥沃，氣候溫和，盛產稻米絲茶，民間夙稱富庶。吾家世代爲絲商，先君靜庵公在鄉經營收集轉運之事，先伯少欽公在滬與洋商直接交易，時人稱爲絲通事。家中生計，賴以維持。

先祖右娛公課子甚嚴，先君兄弟六人皆親自教讀，寫作俱佳。先伯善榮公嘗爲上海申報主筆政，當時頗有文名。地方上之重要訴狀，皆就商之。吾父慈祥長厚，急公好義，吾母徐大夫人治家勤儉，敬長慈幼，鄉里稱賢。二老平素，約以持己，厚以待人，垂爲家訓。

余五歲入鄉塾讀書。入塾之日，家人以麥糖一方裹以紅布置于方凳上，使余坐於其上，昇入學塾。鄉俗以麥糖性黏固，取其爲學有恆勤而不輟之意，有如麥糖之黏固不離其位也。是日，吾母隨至塾中。面告塾師曰：「吾兒如不聽教，可鞭撻之，雖傷吾無怨言也。」

當鴉片戰爭及中法戰役之後，國人懷於對外戰爭之慘敗，羣思所以奮發圖強。平時鄉間父老多聚談富國強兵之道，子弟則有負笈遠遊沿海都會觀摩新政規模之心。當時父老言中法之役，我軍於沿海陣地鋪以竹管，法軍登陸後，因法人兩膝行路不能彎曲，多俯地就擒，認爲此乃我國戰畧高明足以勝人之處。類此見解，皆屬無稽之談。亦可見當時國人對國際知識之茫然也。

余之次兄省之早歲赴滬就學於聖約翰書院及電報局學堂，學習英文，兼研時務。余得余兄之介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入南京妙香庵之江寧府立同文館。此館時方草創，設備簡單。課程有法語英語兩種，着重尤在華文。教授方式偏於背誦，以「法語入門」及「英語入門」爲教材。每逢朔望，出題考試。當時此校監督爲一候補道員，嘗騎黑驃來校主考。南京濕氣甚重，余因患濕氣病不能再留，一年後即行赴滬。

到滬後，謁見聖約翰書院院長顏永經先生，允予明年來滬入學，顏先生爲吾友顏駿人先生之尊翁，早歲去美游學，乘帆船行七十日，敦品力學，志向遠大，此時鬚髮皆已斑白矣。顏先生并告：彼明年將調任虹口聖公會牧師。今日與黃女士結婚之卜舫濟先生（F. L. Hawks Pol.）將繼任院長。校園中今日張燈結綵，即賀其新婚也。

余於一八八七年到滬入學之時，院長已爲卜舫濟先生矣。卜先生對余督教甚嚴，愛護甚殷，受教三年，得益滋多。

聖約翰書院時有學生七八十人，信教學生免費，非教徒繳納學費：最初每年八元，後增至十元，至余離校之時增爲十二元。校方除供給食宿而外，每年另給小帽一頂，鞋子兩雙，青布長衫二件，棉襖一件。放學時，並給銅錢百文爲車費。書籍及醫藥費用亦由學校供給。蓋其時入校學生不多，故有種種優待，以廣招徠。其後英文在上海商界逐漸流行，畢業學生可在洋行任事，收入甚豐，書院學生乃逐漸增多。卜先生留長辮，衣華服，矩步規行，儼然中國紳士。其人態度嚴肅而誠摯，辦事認真不苟，學校在其任內發展甚大。

其時學校教育，着重傳道。每日須上教堂讀聖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下午各一次，星期日則中午一次晚間一次，星期六下午無聖經課，學生在操場上體育課，打球爲樂。

學校教師，其時約有十人。美籍者爲卜先生，以院長兼授歷史。英籍者一人，教授英文。加拿大籍者一人，爲校醫兼授生理學。此外皆華籍，一授數學，一授英文，餘皆教授華文。

余在聖約翰書院三年中，有兩事給余印象最深者：

一日，卜先生於歷史課上講戰爭之意義。卜先生言：戰爭不一定は壞事。凡爲正義而戰之戰爭，乃維持人類和平及世界秩序之必要條件也。余默思中國民族傳統之反戰觀念，未必全非。自是余對戰爭之意義有新的認識。

又一日，余在卜先生辦公室內，見美籍兩教士來訪，言其路過曹家渡時爲中國兒童擊傷之故事。（曹家渡在租界之外，其道路則爲租界當局越界所築。）時方盛暑，兩教士（ingle及Logan Ross）以團扇蔽面，乘人力車來梵王渡。途遇華童，以小石擊之，將團扇打破，並傷兩教士之額角。余當時問以彼等被擊之後，如何對待華童。彼言：彼等停車，告誡華童：不可爲此無禮之事。對於華童，未曾有絲毫責罰。

余聞言，對兩教士之容忍態度，不禁肅然起敬。蓋當時在華之洋人率皆粗暴無禮，社會上對於洋人之觀感印象甚不佳也。此爲余對洋人人品道德有新認識之始。

在此三年中，余曾一度欲往香港就學，以卜先生勸阻而止。

一八九〇年余入胡維賢先生主辦之國文學院，專研漢文兩年。至一八九三年，隨楊欽差赴美。

留美時期（一八九三至一九〇一年）

光緒十九年（公曆一八九三年）楊子通欽使（名儒）奉派爲出使美日秘國大臣，余隨任爲翻譯學生。同年八月底抵美。時余年十六歲。

當時駐美使館館員有：二等參贊何彥昇，三等參贊胡維德，二等翻譯官莫鎮藩，三等翻譯官鍾文耀；隨員三人爲蘇劍劍及徐尙二君。徐尙二君爲總理衙門所選派，尙爲書辦，徐爲例行公事之主稿人。翻譯學生爲李丹麟及余兩人。另有差官兩人（其中一人爲理髮師），廚師二人，裁縫二人。時使館館址方由西北區之杜邦園（Dupont Circle）遷至西北區第十四街與耶魯街轉角處（Yale Street 今改名爲 Fairmont Street）。

其時駐美欽差兼駐秘魯及西班牙兩國，（「日」爲日斯巴尼亞（Espana）之簡稱，係指西班牙，非指日本。當時官書約章中，西班牙皆譯作此名。）故稱出使美日秘國大臣。其任期爲三年，第一年駐美，第二年駐西班牙，第三年駐秘魯。三年任滿後，或留任，或他調，或

回國。欽差大臣出國之時，一次領足三年經費，及往返川資。駐美國、秘魯及西班牙三國使館人員，及所屬領事官員，及北京上海文報局人員共約五十餘人，皆由欽差大臣指派。經費亦由欽差包辦，不須報銷。派在外館工作人員三年任滿後，得「異常保舉」。京滬文報局人員（文報局駐北京上海兩地，專辦駐美秘書使館文電傳遞之事。）任滿後，得「尋常保舉」。其時清廷制度升遷嚴格，保舉難得，隨任人員有專爲「異常保舉」而來者，每至第三年初奏保以後，即行返國。欽差大臣之第三年經費，因留館人員薪俸減少，常有盈餘。故駐外欽差在當時官員之中，係屬優美之缺。

又欽差大臣任滿後，調任他缺之美惡，往往賴京中人事之維持調度，而年節所送冰炭兩敬，關係甚大。所謂冰炭兩敬者，係指一年三節之禮金。駐外欽差對職務上有關在京之長官同僚，皆有餽贈。夏稱「冰敬」，冬稱「炭敬」。此種習氣，至民國以後始行廢止。又欽差大臣對兩宮（即慈禧太后及光緒帝）年節萬壽之貢品，亦甚著重。

楊欽差在任時講究一般衙門儀節。其辦公室外有差官二人侍立，館員入見，皆須報到請見。館員離館，亦須請假。平時辦公有翻譯二人隨侍在旁，每逢朔望館員齊集館中，向欽差請安，謂之「上衙門」。差官俟館員到齊後，以「手本」呈報欽差，欽差曰：「道乏」，館員乃散。每逢端午節中秋節以及欽差及其夫人之壽辰，館員皆須送禮稱賀。欽差受禮後，則以筵宴爲謝。欽差眷屬及館員眷屬當時皆住館內。膳食由廚師料理，費用由館員按照薪俸成數分擔。欽差及其眷屬不付分文費用。